

阅读文化



张俊彦：读一流书《爱因斯坦传》随笔

在我苦难的青少年时代，除了了不起的母爱之外，那时给我的心里以浓浓春意的，还有堪称人类一流书籍的《爱因斯坦传》。爱因斯坦有一句幽默的名言：“我一辈子蔑视权威，命运捉弄我，竟使我也当上了权威。”对这句话我特别敏感，懂得只有不盲目崇拜权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权威。我一生奉为座右铭。

这本好书，影响了我的人生历程。其最大的魅力是它给我真切地描绘了爱因斯坦如何做人，尤其是提供了人生处于低潮时如何跃起，如何超越的人生方法论。

这位创立相对论，与牛顿齐名的伟人，青少年时代的整体处境和我一样糟糕。然而，一九零五年，二十六岁的他，处在贫困与屈辱中的爱因斯坦，一年内在莱比锡出版的《物理学纪事》上，发表了三篇惊天动地的论文。科学史家评论说，三篇论文都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，可以三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。

我读了以后，反复对自己说：“我有什

么资格向厄运低头？有什么理由不向爱因斯坦看齐？”

与爱因斯坦之比较，使得我不再有“母鸡的理想只是为了一把米”的短视，从此产生了要向爱因斯坦看齐的大抱负，每天均的自我激励，奋发图强，默默地要挤入爱因斯坦称道的、要为人造大福的科学殿堂。

我们每个人都像电子一样，被锁在一定的能级的社会轨道上运转。只有注入了更高的精神或者物质能量，才会跃迁到新的轨道上去。第一流书，就有这样的神奇效应：向人的精神领域注进了立即能开始跃迁的高能量。《爱因斯坦传》给了我无穷的高能量，推着我在做人以及科学领域里不断跃迁到新的能级轨道，一直到现在。

英国大历史学家汤恩比，他在研究人类文明时，概括出了文明是否鼎盛的两个标志：一是社会精英是否非常富有创造力，二是大众是否十分愿意对精英进行效仿。所谓第一流的书，譬如《爱因斯坦传》，



就是拷贝精英如何创造的书,要给非常愿意效仿的大众提供模仿的范本。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,就看它是否提供了足够多的拷贝精英分子全面创造的第一流的书,还要检验大众对精英创造精神仿效的热情程度。

为此,我对目前的境况也是颇有忧患意识的。一个社会,倘若在统计意义上整体趋于“八卦化”,读一流书的人很少,非一流的人却成为大众热门关注和模仿的对象,那么,岂能期待有一流的社会出现?岂不是像汤恩比所说的,这个社会的文明可能正在衰落?我这不会是杞人忧天吧?

谈到读一流书,我的另有一个强烈体验是,在今天这个所谓的e时代,“开卷有害”的机率远远大于“开卷有益”。

古代写书的人本是凤毛麟角,由于出书难度的制约,其成书的很少;在经过圣贤们按照他们的伦理和知识标准进行筛选,所剩下的就更少。那时所能传播的书,绝大多数该算是当时的一流书了。东方读书金句——“开卷有益”流传千古;诗人杜甫也说,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。

在西方,历来都称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、“书籍是灵魂的家园”云云。因此,西方人和东方人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历来也都是提倡开卷有益,多多益善的。

然而,到了有电子或光子负载巨量资讯的e时代,到了由国际互联网高效传播资讯的数位化时代,还是开卷有益吗?

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和计算,每个月世界发表的论文,一个人要用四十八年时代才能读完。由此可见,人的一辈子都不可能读完自己专业领域里的两个月发表的

论文。

显然,在此资讯爆炸的境况下,如果读了对自己来说不是十分重要、不是非常迫切的书,那就是“开卷有害”,害掉了宝贵的时间。

当下的办法是,加强文献的更精细分类,提供快捷检索的索引引擎,让学者们尽量花最少的时间检索到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文献,然后阅读,以力求避免上述两种性质的“开卷有害”。

其实,这个办法只能小补于事,因为如今资讯的海洋太浩瀚了。

怎么办?又是一流书《爱因斯坦传》,给了我治学方法论的大启迪。

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,根本没有条件阅读大量文献。他的独特的治学之道是,主要去查阅他人大脑和独自进行“思想实验”。

他在伯尔尼专利局当小职员时,为了补助家庭开销的严重不足,还给在校大学生补物理学课,哪晓得私人授课变成了学术上的热烈讨论,进而演变成了几位不同学科朋友的多学科辩论会。他们定期聚会,争论当时最重大的科学和哲学问题。他们就是在激烈争论中相互阅读大脑,筛选出对方在辩论中提出了什么聪明的问题和如何提出问题。这才是最具活性的原创性养料。爱因斯坦后来总结出一句名言:“聪明的问题比聪明的答案更有价值。”

我在交大读硕士和博士时,有幸遇到了从美国MIT回来的大学者朱兰成院士,他是电磁波及雷达研究方面的三大国际权威之一。我只听过他一学期的课,但是



我和他在一起密切相处了十二年(一九六一——一九七三)。我学爱因斯坦,平时非常用心倾听朱教授聊天,留意他如何提出问题和提出什么问题,陪他到城隍庙去吃小吃,帮他买酒,并在他酒兴正浓、不拘礼仪时,大胆与他争论一些问题。我阅读他的风范,阅读他的大脑,比起阅读他的著作更能活化我创造意识的效果,不知要增强多少倍。学问可以自己来,但风范和师承以及思想却是要与身教一脉相传的。

阅读第一流的大脑,等同于或者超过于阅读第一流的书。

我把这个阅读第一流的大脑的方法,还带到我当校长之后的教育实践中来了。

我是在举一反三地试图活用爱因斯坦的阅读他人大脑的方法。

我频繁出国,参加与我们交大所设科系相关的国际重要的会议。因为在这些会议上,会提出当今人类最聪明、最富有前瞻性的科研问题。这些问题和答案,大多尚未发表,期刊文献上不可能读到。可是,我们却能通过新鲜活泼的方式,阅读与会者的大脑,近水楼台先得月,何乐而不为?我把这些问题和答案及时带回学校和同事共享,这对我们关于科研方面的正确决策,无疑其意义十分重大。

我频繁出国,去与国际名校建立教学和研究的合作关系,进行活性的“大脑联网”。我访问这些学校的校长和著名学者,目的是通过面对面的自由交谈,高效地得到他们关于e时代办学的原创性想法,以激活我们交大,也写出自己行之有效的办学“教育新程式”来。

我还出去把不少国际知名学者约请

到学校来,与师生展开现场对谈,目的也是在进行爱因斯坦式的阅读名人大脑的活动,立竿见影地在师生们身上注入高智能的能量,使我们能够不断跃迁到高能级的科研和教学的轨道上去。

我提倡学生要进行爱因斯坦式的狂想,大胆地提出非常规的聪明问题,并且进行多学科组合在一起的自由辩论,以便能在阅读他人大脑中像爱因斯坦那样进行卓越的思想实验。

也许有人要问,经常出国,校长的常务工作怎么办?我走遍天涯海角,不断地编写e时代办学的新程式,通过每秒三十万公里传播速度的电子邮件、传真,及时告知我的团队,一点也不受时空之隔的妨碍。此外,我对我们团队充分授权,由他们创造性地将我的火花式的领悟,发展成系统的可操作的“子程式”,逐渐形成我们交大的新教育体系。我说过,交大不是只有我一个校长,通过广泛阅读国际一流人物大脑的机制,通过充分授权,交大就出现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校长。

信笔写来读《爱因斯坦传》两则随想,不禁让我惊叹:一流书或一流大脑的能量,实在太了不得了。这注入我脑的智慧能量到底有多高大呢?又让我想到爱因斯坦关于能量和质量关系的公式: $E=MC^2$ 。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!就是这等能量,能够把我们自身潜在“质量”激发,可期待变成与光速平方相乘积的核爆炸式的高智慧、高人品来。

(作者为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校长,转录自交大校友会杭州分会会刊)

